

宋庆龄主持向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业绩

蒋佳妮

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在香港邀集中外人士发起成立了一个国际性的救援组织——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保盟”成立后,在宋庆龄的直接领导下,从事筹募款项,进行医药工作、儿童保育工作与成立工业合作社等活动。同时,宋庆龄和“保盟”还利用各种方式向世界各国人民和海外华侨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并着重介绍、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所取得的伟大抗战业绩,为争取各国人民和海外华侨的同情和支持,吸引和团结大批国际友人、海外侨胞投身向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东方战线,发挥了巨大作用。



1938年,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成员在一起。

把《保卫中国同盟通讯》办成向世界展示人民武装的重要窗口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各地抗日根据地游击队一直致力于对日作战,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但八路军和新四军取得这些战绩并不为外界所了解。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多处于偏远地区和敌后,缺乏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宣传工作,另一方面则与国民党顽固派对抗日根据地实施的军事封锁与包围有关。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对新闻报道采取严密的检查制度,外界无法获得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的真实信息。鉴于此种情况,宋庆龄和她领导的“保盟”意识到,“保卫中国同盟”不但在为中国的斗争争取国际同情、为前线与敌后的战士争取物质援助方面要负起责任,还“应该承担起向全世界传播我国的真实情况的职责”。

1938年下半年,宋庆龄领导“保盟”创办了中央机关刊物《保卫中国同盟通讯》(简称《通讯》)。该刊物专门向国际友人和华侨介绍保盟的工作和物资需求,并将重点放在对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的介绍、宣传上,积极致力于报道被封锁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团结抗战的真实情况。

《通讯》早期是一份油印本的英文简报,邀请进步的外国记者贝特兰、爱泼斯坦负责编辑出版工作。从1939年4月1日起,《通讯》改为铅印出版的英文双周刊,一直到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共出版了36期。为了扩大在广大华侨、华人中的影响力,1941年初还出版了中文版,由邹韬奋和金仲华担任编辑。

宋庆龄曾回忆说,《通讯》的出版发行,是为了“说明了哪些地方真正进行着对敌斗争”;“我们刊登了描绘中国人民在战场上和在自力更生的生产运动中英勇战斗的生动报道;此外,我们揭露了那些贪污腐化背信弃义的人们,他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进行种种罪恶活动来破坏这一场光辉的事业”。为了粉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宋庆龄指示“保盟”利用自己的出版物,积极宣传报道八路军和新四军。1940年8月,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了以切断日军交通动脉、打破敌人抗日根据地的封锁为主要任务的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在战略上有力地支持了国民党正面战场。《通讯》第一时间对八路军开展百团大战的情况进行报道:“八路军在8月和9月的重大攻势中,攻占了华北近50处重要据点,包括历来被称为‘通向山西的门户’的娘子关,以及具有战略地位的大段线路。这一振奋人心的篇章,是对其他地区向日本人作出的道德退让的有力补偿。”同年11月,《通讯》又详细报道了百团大战的战况,列出了八路军在前三个星期内取得的战果。为了更好地让读者了解八路军的战绩,还专门刊登了“华北游击区区域图”示意图,显示八路军所在的主要区域。

美国海军陆战队少校埃文斯·卡尔逊在抗战初期不畏艰险,深入敌后和正面战场,拜会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并认真考察了人民军队的抗战,发现“在共产党军队内有着友好、自力更生和真正的民主”。后来,他“以忠实地宣传中国抗战,特别是中共及八路军抗战的真相为头等大事”,又对新四军进行了访问。《通讯》曾刊载卡尔逊反映新四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地报告《在长江流域的游击战士中间》,让世界进一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

民的艰苦情况和不屈斗志,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值得一提的是,《通讯》还刊载八路军、新四军与国民党军队相比较的文章,指出两者之间的不同点:“大部分中央军驻扎在后方,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则深入敌后,出色地组织起游击战根据地。和其他军队不同的是,这两支部队始终执行了武装动员民众的方针,达到有组织的团结抗日。别的中国军队只是把他们自己视作职业士兵,这两支部队却总是履行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拓者和建设者的职责。这就是八路军、新四军被称为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先鋒的原因。”

广邀国际友人撰稿,报道中共的方针政策及人民武装的战果

《通讯》还专门开设“战地报告”栏目,邀请在华的国际友人如马海德、路易·艾黎、白求恩、王安娜等为《通讯》撰稿或提供文章,向世界宣传报道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方针政策及其战果。新西兰记者、作家詹姆斯·贝特兰1937年来远东旅行研究,同年由北平秘密前往延安,访问了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抗战的一系列问题。在1938年至1939年间任英国《每日先驱报》和《曼彻斯特卫报》驻华特派员,此后应宋庆龄之邀,参加保卫中国同盟,与爱泼斯坦共同负责“保盟”的国际宣传,编辑出版《通讯》的国际专刊,编辑出版《贝特兰多次深入抗战前线与后方,采写了不少好文章,揭露日军的侵略罪行,向世界介绍了中国人民武装的抗战业绩,有部分战地报告文章就刊发在《通讯》上,如关于国际和平医院的报告,《穿越中国战场,随救护车赴西北的行程》《同日本摊牌?》《纪念白求恩》《日本在华北的进攻》等。宋庆龄

通过演讲和信函等方式向世界介绍、宣传中共领导的抗战活动

宋庆龄曾说:“我所发表的文字许多是以国外读者为对象的。”宋庆龄先后为《通讯》撰写了多篇文章和评论,同时,她还通过演讲和信函等方式向世界介绍、宣传中共领导的抗战活动,并为中共和人民武装争取外界援助。1937年8月,宋庆龄发表文章《中国是不可征服的》,文中指出:“经过十年内战,国内许多地方遭到摧残,而共产党非但没有被打败,反而成了抗日的先鋒。从最近访问红区的《伦敦每日先鋒报》记者斯诺的文章,我们知道了红区的真实情况,并且认清了那些从来不敢走到所谓‘匪徒’近旁去看看的人所作的宣传是多么荒谬与虚伪。”

1937年9月,八路军取得了平型关大捷,这是中国军队在全面抗战爆发以来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八路军首战告捷,打击了日军的疯狂气焰,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同年10月,宋庆龄在向美国人民发表的演讲中,特别提到此事,“过去的红军即现在的八路军,已是国军的一部分,正加入作战。第一次与敌军接触,就获得压倒一切的胜利。”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宋庆龄也在文章和讲话中多次提及,她向世界呼吁:“我们为什么重点叙述边区?因为它们应该比诸其他地区和中国军队优先获得援助吗?不是。我们重点叙述游击区是因为这些游击队面对的作战对象,占在日军的几乎一半,而最近三年以来从未得到政府的援助,包括军火、金钱和医疗物资。”

1943年,宋庆龄致信美国中国救济联合委员会委员坎农,在信中提到:“游击队在几乎没有武器和外界支援的情况下,不仅在装备精良的占领军的后方建立、保持和扩大了抵抗基地(这些基地总有一天会成为反攻的前哨),他们还赢得了人民军队的光荣称号,而这样的军队是绝不会扔下一个伤员不管的。”

通过宋庆龄和“保盟”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各国人民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的了解,从而更加广泛、更加积极地支援中国抗战。许多国家都成立了援华会,积极支持、配合“保盟”的工作,并通过“保盟”,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提供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帮助,有力支援了中国抗战。与此同时,宋庆龄和“保盟”救济工作逐步扩大,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援华团体和东南亚、南洋的华侨建立了稳定持久的联系。《通讯》和其他出版物的影响不断扩大,发行量由最初的1000册上升到2500册。

(作者单位:宋庆龄陵园管理处)



鲁中军区二团击毙日军少将

李仲

1945年5月,山东日伪军为阻止八路军的夏季攻势,拼凑了3万余人的兵力,以八路军鲁中、滨海抗日根据地为重点,发起大规模“扫荡”。5月5日,日军第五十三旅团旅团长吉川资少将,率领日军一个大队400余人及伪军600余人向沂源进犯。

6日,八路军鲁中军区二团奉命返回鲁山,二团三营营长刘佐指挥部队向石桥方向连夜前进。7日凌晨2时许,二团三营侦察班在石桥附近发现有伪军活动,立即向营长刘佐报告,刘佐断定这是敌人的先头部队,一面向团首长报告,一面派侦察班进一步侦察敌情。不久,侦察班活捉了敌人的一个便衣侦探,经审讯得知,敌人并未发现二团的行动,仍继续向石桥方向前进。刘佐得到报告后,认为机不可失,应利用石桥一带的有利地形打一个伏击战,于是和其他营领导迅速制定了在石桥北山伏击敌人的方案,并报请团领导批准。

刘佐率部赶到石桥,命令各连迅速进入战斗位置。按照既定部署,5时许,七连进至345.6高地南坡,八连、九连进至北坡,1个排担任警戒,防敌迂回。

7日清晨,敌人缓缓进入三营的伏击圈。前哨刚过,又有几十个骑马的敌人进入石桥西北河滩的开阔地



独立二团李山“劫道”歼敌

赵荫棠

1943年,日伪对共产党、新四军领导的大(湖)滹(湖)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清乡”。中共太滹地委根据上级的指示,决定积极开展游击活动,主动出击,彻底粉碎日伪的“清乡”企图和伪化活动。据此,战斗在这一地区的新四军十六旅独立二团对兵力作了适当分散,和当地的武装密切配合,组织短小精悍的短枪班,采取“外线出击,内线坚持”的办法,在“清乡”区内穿插,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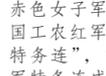
当时,宜兴芳桥镇上驻有日军1个中队和伪军1个排,属和桥镇日军管辖。1943年4月,独立二团侦察员掌握了芳桥磨盘山日伪驻军的行动规律:该敌每月都要由磨盘山出发,途经架弓山、李山,去和桥镇领取给养和军用物资,上午去,下午原路返回。

据此,中共太滹地委书记陈立平和独立二团团长江洪才研究制定了一个对芳桥据点日伪军的“劫道”计划,决定由二团二营的一个连执行这项任务,并确定伏击地点设在李山。李山东南约两里路有一个五六户人家的自然村名叫早沟村,处于和桥至芳桥的大路北侧,是个理想的埋伏地点。

5月8日,芳桥据点的日伪军出发前往和桥镇领取军用物资,杨洪才立即命令战士做好战斗准备。

14时左右,伪军在前,日军在后,走进伏击圈。当敌人全部走进伏击的火力网时,一声令下,各连一齐开火,手榴弹也一个接一个飞进敌阵,敌指挥官和机枪手首先被击毙,残敌企图躲到麦田里负隅顽抗,却遭到埋伏在道路两侧战士的猛烈打击。见敌人阵脚大乱,杨洪才立即命令战士做好战斗准备。

仅半小时,李山伏击战就胜利结束了。这一仗全歼日伪军20人,其中击毙日伪军5名、伪军3名,俘虏日军1名、伪军数名,缴获机枪1挺、步枪20支、左轮手枪1支、掷弹筒1具、指挥刀1把以及一批军用物资。李山伏击战的胜利,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更加坚定了太滹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清乡”斗争的必胜决心。



女子军建功沙帽岭

吴小龙

1931年5月,中共琼崖特委在赤色女子军连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三团女子军特务连”,由琼崖花任连长。女子军特务连成立后,琼崖花即带领全连投入紧张的军事训练和文化学习,担负起保卫领导机关和看守犯人的任务,还宣传发动群众参军参战,配合主力部队打仗。

当时,国民党琼崖乐万地区“剿共”总指挥陈贵苑,倚仗手下民团人多势众、武器精良,经常对苏区进犯。6月,红三团决定将陈贵苑民团诱入苏区腹地予以歼灭,把诱敌深入的任务交给了琼崖花率领的女子军特务连。

26日早晨,红三团和赤卫队浩浩荡荡向万宁县方向开拔,到达万宁县的加任村后,就在密林中隐藏起来,并于当天晚上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班师返回苏区,埋伏在沙帽岭的峡谷山林中。陈贵苑在知道红军主力已远去万宁县,苏区只有女子军留守的消息后,以为偷袭苏区时机终于来到了,于是带领几百号民团人马,兵分两路杀气腾腾地往苏区扑来。

敌军进入苏区后,就遭到女子军的阻击。为了诱敌进入红军主力的埋伏圈,女子军且战且退。陈贵苑果然上当,竟不等另一路民团到

达,就贸然下令追击。琼崖花指挥女子军将敌人引向大部队的伏击圈。敌人不知是计,在后面紧追不舍。当敌人被引入红军主力的埋伏圈后,琼崖花指挥女子军回身发起反攻,顿时军号声响起,杀声震天,枪声震撼山谷。敌军猝不及防,被击毙多人。直到此时,陈贵苑才知中计。眼看伤亡惨重,他不敢恋战,指挥团丁疯狂突围,企图夺路而逃和另一路民团取得联系,却怎么也突不出红军的包围圈。

不久,红军发起总攻,琼崖花率领女子军战士当先冲入敌阵,活捉了敌人的号兵,用枪顶住号兵的头部,命令他吹响撤退号,尚在顽抗的敌人听到号声,顿时大乱,很快被红军歼灭。正在路上的另一路团丁听到沙帽岭枪声大作,根本不敢前来救援,而是一溜烟逃回据点去了。此次战斗,红军仅用1个小时便击毙团丁百余人、俘70余人,缴获长短枪146支和弹药、大米、鱼虾等物资九十担。陈贵苑以下团丁头目被尽数活捉。女子军无一伤亡。

第二天晚上,红三团文艺宣传队举行了隆重的祝捷晚会,慰问在沙帽岭战斗中荣立战功的女子军指战员。

宋庆龄和“一碗饭运动”

贾晓明



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于汉口正式成立。理事会由国共两党要员、爱国民主人士组成,宋庆龄出任名誉理事长,其宗旨是“利用后方的丰富资源和从敌占区来的难民建立规模不等的工业合作社,生产工业和生活用品供给军民”。1939年1月,在香港成立了“工合”国际委员会,宋庆龄任名誉主席。由于宋庆龄的崇高威望,“工合”国际委员会一成立,就获得了国际友人、海外华侨的广泛支持。

宋庆龄对“工合”工作极为重视。1941年5月初,宋庆龄决定以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的名义在香港发起“一碗饭运动”,为“工合”募捐,以扩大“工合”规模救济难民伤员支援前线。“保盟”在香港成立了“一碗饭运动”委员会,

宋庆龄任委员会名誉主席。“一碗饭运动”委员会号召香港民众“用节约一碗饭的精神以物力支援祖国抗战”,并规定了募捐办法:发售餐券1万张,每张2元,餐券的价值本可享受几道菜肴,但认购者只能持券到提供赞助的餐馆吃炒饭一碗,发售餐券的所有收入全数赠送给“工合”。

为推进“一碗饭运动”的积极开展,“保盟”特别印制了各种精良的传单和标语,高悬在港九码头、车站及娱乐场所。由“保盟”资助创办的香港《华商报》,为“一碗饭运动”提供了宣传阵地,刊登了宋庆龄为“一碗饭运动”所写的题词以及多篇由夏衍、张友渔等著名文化人撰写的盛赞“一碗饭运动”的文章。香港餐饮业同仁积极支持这一爱国运动,踊跃报名参加,不但不要收回成本,而且还“竞相提高报效的碗数”。各界人士也纷纷响应,认购餐券及代销餐券行动非常踊跃,很多海外华侨也汇款到香港,认购餐券。

7月1日晚,“一碗饭运动”开幕典礼如期举行,“保盟”领导、“工合”

代表以及救亡团体代表、文化界名人、工商界领袖、港英政府官员等150余人出席。随着宋庆龄乘车到达典礼现场,“向孙夫人致敬”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掌声雷动。宋庆龄遂提前下车,向来道欢迎的人群含笑致意。晚8点整,典礼开始,宋庆龄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对“一碗饭运动”给予高度的评价。她说:“香港的‘一碗饭运动’,更含着一份深长的意义,因为这次捐款是要帮助工业合作社去组织和救济难民伤员,这是巩固经济阵线,是生产救国,是帮助人们去帮助自己,是最恰当的一种救济事业的掌声。”

会场主席台上摆着一批孙中山的墨宝与纪念品,是宋庆龄捐赠给“一碗饭运动”的。当宣布义卖开始时,因与会的各界代表积极争购,临时决定改义卖为拍卖,虽如此,仍很快被抢购一空。

8月1日,是“一碗饭运动”开展的第一天。香港车站、码头、机场、大街小巷、娱乐场所乃至汽车上到处可见